

当代西方社会的 危机与困境

曲伟杰 著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www.buptpress.com

当代西方社会的危机与困境

曲伟杰 著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www.buptpress.com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自觉的问题意识为导向,通过深入考察当前西方社会各领域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揭示出西方民主制度固有的缺点与不足。近些年,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模式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实质性的衰退,西方社会正面临着巨大的、结构性的共识撕裂的危机,这种危机表现在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多个方面。不少西方学者甚至忧心忡忡地预期,西方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化、转折和重组。深入研究西方国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这样做有助于我们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缺陷与不足保持清醒的认识,增强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信心和定力,更加自觉地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来之不易的实践成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西方社会的危机与困境 / 曲伟杰著. -- 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5635-5611-3

I. ①当… II. ①曲… III. ①经济发展—研究—西方国家②社会发展—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F113.4②D5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第 239124 号

书 名: 当代西方社会的危机与困境

著 者: 曲伟杰

责任编辑: 张珊珊

出版发行: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10 号(100876)

发 行 部: 电话: 010-62282185 传真: 010-62283578

E-mail: publish@bupt.edu.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mm×1 000 mm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205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35-5611-3

定价: 38.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

前言

近些年，西方国家的民主体制正面临着难以解决的困境与危机。当前，西方民主危机有多重表现形式，其中，新民粹主义的崛起是最为明显的标志之一。大西洋两岸，右翼民粹主义思潮遥相呼应。在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声势逐渐扩张，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执政逐渐成为趋势，匈牙利、波兰、奥地利等国都是右翼政党执政；在美国，反移民、反全球化等另类右翼思潮来势凶猛，对自由派精英所大力宣扬的进步主义价值叙事造成极大的冲击。从根本上讲，新民粹主义的崛起不是一夕之间发生的，它是西方国家内部存在的深层次问题长期演化的结果。

本书的研究重点在于全面探讨当代西方社会各领域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在经济上，西方社会的结构性的经济不平等是出现诸多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文化上，很多右翼政党的支持者关切的核心议题是移民问题，他们既反对移民分享福利和抢占工作机会，更加反对移民所带来的多元化的身份和价值认同。

通过审视当代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危机和困境，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自由主义民主的实质与不足，增强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信心和定力，这是本书的研究目的。西方国家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对自由主义民主模式提出了严肃的挑战，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揭示出西方民主体制所固有的缺点与不足。

目 录

导论	1
第1章 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局限	7
1.1 自由主义民主的实质	7
1.2 个人主义思潮的缺点与不足	9
1.3 自由主义民主合法性的薄弱基础	13
第2章 西方社会的经济不平等及其后果	20
2.1 社会平等的理论基础	21
2.2 西方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现状	29
2.3 “两个美国”——美国梦的衰落	38
2.4 本土主义叙事的张扬	45
第3章 文化冲突视野下的西方社会危机	60
3.1 保守派对世俗化的反弹	61
3.2 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悖论	71
3.3 价值虚无主义的流行	80
3.4 传统道德话语的回归	89
第4章 西方民族主义社会思潮的兴起	101
4.1 身份政治的凸显	102
4.2 政治共同体与边界	110
4.3 重提民族国家	120

第5章 当代西方政治运作的困境	130
5.1 社会共识的破裂——大众与精英的对立	131
5.2 新媒体对传统政治秩序的冲击	144
5.3 后真相政治与社会信任的下降	153
第6章 西方社会危机的现实启示	160
参考文献	169

如果从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城邦民主算起，西方民主已经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漫长发展历程；即便不把中世纪的千年历史计入其中，仅从近现代算起，西方民主制度也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历程。这期间，西方民主制度发生过若干次的曲折与反复，而关于民主的理论也演化出众多的思想流派。现在，流行于西方社会的有代表性的民主理论（包括协商民主、精英民主、多元民主等），都可以在更早期的政治实践和思想作品中找到自身的理论渊源。但是，总体上讲，从古代到近代，民主制度并没有赢得西方思想家的广泛认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黑格尔、马克思等许多西方思想家都对民主制度持批判性的态度，他们也都对民主制度所可能导致的问题进行过深刻的反思。西方民主制度的大范围扩张，发生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尤其是 20 世纪后半叶，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将其概括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亨廷顿指出，与古希腊民主不一样，“现代民主并不是简单的村庄、部族或者城邦的民主；它是民族国家的民主，而且它的出现也与民族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①。在 18 世纪 50 年代，还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在西方世界中存在。直至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把民族国家和人民主权这两种重要的政治观念推向了历史的舞台，此后，西方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就同时伴随着民族解放的浪潮。当民主政治与民族国家成为一对相辅相成的“孪生”观念之后，民主政治才开始了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

但是，近些年，西方民主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和挑战，民主制度的缺点与不足日渐凸显出来。正如《经济学人》杂志在 2014 年 3 月的一期封面文章中所说的那样：“民主正处在困难的时期。”^② 这一评估比较准确地概括了西方民主政治的现状。稍微浏览一下最近几年西方学者出版的一些学术著作，如：*The Life and Death of Democracy* (John

①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9 页。

② *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 The Economist, March 1st-7th, 2014, p43.

Keane, 2010)^①、*Democracy Against Itself* (Mark Chou, 2014)、*Four Crises of American Democracy* (Alasdair Roberts, 2017)、*How Democracy Ends* (David Runciman, 2018)、*The People Versus Democracy: Why Our Freedom Is in Danger and How to Save It* (Yascha Mounk, 2018), 我们就可以想见问题的严重性。仅从这些作品的标题中就不难发现, 西方学者对自身的社会制度正在逐渐失去信心, 已经完全没有有了弗朗西斯·福山当年提出“历史的终结”这一观点时的自信。实际上, 即便对于福山而言, 他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思想, 虽然并没有完全放弃历史终结论的核心观点, 但是他也承认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民主的衰退。2016年, 福山在 *Foreign Affairs* (《外交事务》) 杂志 (2016年7/8月号)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American Political Decay or Renewal?”。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是, 认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已经遭受了实质性的衰落”^②。

曾经的历史终结论者都承认西方的自由民主出现了全球性的衰退, 这就足以证明西方社会确实存在着诸多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美国学者拉里·戴蒙德的研究指出: “民主衰退的开始可以追溯到1999年的巴基斯坦军事政变。该次政变意味着许多新生的民主体制不能发挥良好的效果, 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和平以及良善的治理。”^③ 从2006年开始, 全球性的民主衰退变得更加明显, 而新民粹主义的泛滥就是民主衰退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在希腊、匈牙利、意大利、波兰、斯洛伐克和瑞士6个欧洲国家中, 民粹主义政党占据议会多数席位。”^④ 到了2016年, 民粹主义、“后真相”政治等又成为西方国家的政治话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特别是伴随着美国总统大选, 特朗普的最终胜出超出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和主流媒体的预料。透过美国大选, 我们可以看到精英与大众、上层社会与底层社会之间的分歧与对立错综复杂、难以消除。在这一大背景下, 西方自由派精英所大力宣扬的全球主义、权利革命、多元文化主义等进步主义的价值叙事遭到了空前的挫折和冲击, 而本土主义、反全球化、白人身份认同等偏向保守主义的思想议题开始张扬。不少西方学者甚至忧心忡忡地预期, 西方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化、转

① 该书已有中译本, 参见约翰·基恩:《生死民主》(上、下), 安雯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约翰·基恩是澳大利亚政治哲学家。

②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n Political Decay or Renewal? .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6, p68.

③ 拉里·戴蒙德:《民主的精神》“引言”, 张大军译,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13年, 第14页。

④ 崔建民:《西方新民粹主义泛滥的警示意义和重要启迪》,《红旗文稿》, 2018年第8期, 第35页。

折和重组，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前途晦暗不明。毫无疑问，正是西方社会存在的难以化解的深层次问题才导致新民粹主义的广泛兴起，与此同时，它的兴起也进一步加剧了西方社会本来就存在的问题与困境。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从根源上讲，任何一个为人瞩目的社会问题都不是由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相互叠加、相互作用的结果。西方国家今天所面对的棘手的社会问题不是用一种因素能够解释清楚的。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当代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困境，那就是西方社会巨大的、结构性的共识正面临着撕裂的危机。这种共识撕裂的危机有多重表现，但最为重要的是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经济领域的表现。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的左翼政党倾向于代表工人、少数族裔和移民群体的利益，基本的政策纲领是实行更加平等的财富再分配政策，因此他们主张实行高税收和高福利的社会政策，主张加强政府管制以遏制大资本、大企业、大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掌控，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保障普通工人的利益；而右翼政党倾向于代表企业家、农场主和宗教团体的利益，他们一般会主张采取对企业和个人进行减税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样可以让企业有资本追加投资，雇佣更多的工人，降低失业率，而个人也可以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消费，拉动国内的消费市场。很显然，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的利益诉求及其背后的支持者是不同的。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紧随其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加剧了西方国家内部本就存在的经济政策上的矛盾。目前看来，这一矛盾难以轻易地妥协和调和。

其二，在文化和价值观角度的表现。国内外许多学者业已指出，现阶段西方国家内部正在持续地进行一场影响深远的“价值观对决”或者说“文化战争”。这一对决或战争的实质涉及的是西方人自身的深层次的身份认同，即重新确认“我是谁”的问题。这场价值观对决异常明显地表现为保守派阵营与自由派阵营之间的全方位论争。广义的保守派包括宗教上的保守派，经济上主张小政府、大社会的古典资本主义者，以及强调家庭、责任和爱国等传统价值观念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西方社会的主流精英公开表达的思想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要符合“政治正确”的，也就是要符合自由主义的基本规范——强调个人权利和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在西方，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等同于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这两大意识形态阵营之间的对立。精英更倾向于接受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比如支持各种亚文化群体和少数族裔群体的平权运动、支持更加宽松的移民政策、支持自由流动的全球化

的经济政策等。反之，普通大众则更倾向于接受保守主义的价值观念，比如坚持传统的宗教信仰、反对妇女堕胎合法化、支持更加严格的移民审查制度等。这种深层次的认同危机导致不同群体间的分歧与冲突在短期内根本无法弥合。

其三，在政治领域的表现。西方国家内部在经济、价值观念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加剧了社会共识的分裂程度，社会共识的分裂导致持有不同立场的政党组织之间经常性地处在紧张对立和彼此攻讦的状态中。伴随着民主选举对选民群体的政治情绪的调动，政党轮替下的政治极化现象日趋严重，大量宝贵的社会资源被浪费在情绪化地攻击政治对手上。在政治极化的前提下，安东尼·吉登斯所构想“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根本没有容身之地，不同政党中的温和派成员都面临着压力，他们甚至被称为政治上的濒危物种。今天的美国，秉持温和立场的共和党人有一个专有名词“Rino”（Republican in name only），直译为“只是名义上的共和党人”。仅此一例，我们就足可看出西方政党政治的极化程度。党派之间的恶性竞争让已然出现分裂的西方社会不断走向更深的分裂。结果是，很多关乎重大公共利益的政治议题悬而不决，立法和行政部门的效率持续低下，进而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不满。

基于对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现状的深入反思，在面对西方的各种新思潮、新理论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结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具体国情，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政治经济制度。2014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①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中国梦必须奠定在中国化的基础之上，中国梦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继承与发扬。深入研究西方国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有助于我们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缺陷与不足保持清醒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更加自觉地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来之不易的实践成果。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6页。

第 1 章

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局限

任何关于西方社会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深入研究，因为这一制度模式影响到西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当前西方国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都与这一制度模式有着紧密的关联，西方社会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为西方民主制度的危机。从古希腊至今，西方民主制度在演变的进程中发展出了许多理论流派和具体的政治制度形式，其中，共和主义民主与自由主义民主是西方民主的两大模式，而自由主义民主模式又占据着主流的地位。

自由主义民主倡导一系列进步主义的价值理念，诸如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平等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在所有的这些理念中，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优先性无疑处在自由主义民主的核心位置上。换言之，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作用之一就是要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优先性。原子主义的理性主体观念从哲学基础的角度论证了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优先性。追根溯源，西方社会的问题与困境恰恰说明自由主义民主所依赖的哲学基础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局限与不足。对现代理性自我观念的过度强调极易导致个人主义思潮的泛滥。托克维尔认为，个人主义是民主的产物，并且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发展，若是不加节制，“久而久之，个人主义也会打击和破坏其他一切美德，最后沦为利己主义”^①。将政治合法性完全建立在个人的同意和对个人的保护这一基础之上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又与民粹主义政治是一体两面的。

1.1 自由主义民主的实质

众所周知，“民主”（Democracy）政治起源于古希腊城邦时代。从词源学

^①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625页。

上分析，民主的最初含义指的是村落中的居民（“平民”）的统治。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的梭伦改革被认为是奠定了城邦民主的基础，它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废除贵族的世袭政治权力。此后，为了进一步提升平民的政治地位，克里斯提尼改革又把雅典公民由氏族编制改为地区编制，从而分散和瓦解了传统地方贵族的家族势力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力。到了公元前5世纪的伯利克里时代，雅典城邦民主政治达到了顶峰。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雅典城邦民主走向衰落。最终，在公元前四世纪后期，雅典城邦被崛起的马其顿帝国吞并。对于民主政体的界定，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民主政体是由自由而贫穷的、同时又是多数的人们所统治的政体。此处所说的“多数人”明显地是指城邦中的平民，只要以多数的平民为统治主体的政体一定是民主政体。亚里士多德在论述城邦的构成时认为，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都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富有阶级（the rich class）、贫穷阶级（the poor class）和中产阶级（the middle class）。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划分是以城邦公民所拥有的财产数量的多寡为标准的。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在民主政体之下，没有多少财产的平民应该占城邦人口的大多数，当他们集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形成城邦中最大的一股政治力量。在古希腊，平民是与贵族相抗衡的社会阶层，他们之间的政治斗争贯穿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始终。根据法国学者雅克琳娜·德·罗米伊的研究，在古希腊，平民派“代表着与其他阶级或集团对立的阶级或集团”^①。所以，民主政治也可以等同于“大多数平民（穷人）的统治”。

从制度架构上看，雅典城邦民主与当代西方社会的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当代西方民主政治通常是与选举权、被选举权、代议机构、三权分立、政党轮替等政治设置联系在一起的，古希腊民主政治则与此不同，具体来讲，它主要有以下四点特殊之处。第一，据记载，为了防止政治党派斗争，古希腊梭伦改革确立了以抽签方式选举执政官的制度，具体的方法是，在由4个部落直接选举40名候选人后，通过抽签的办法从中选出9名执政官。从此以后，治理城邦的官员中的多数都是通过抽签的方式产生。在雅典人那里，选举并不是体现民主的手段。亚里士多德明确地说，就任用行政官员而论，抽签法被认为是属于民主性质的，而选举法则被认为是属于寡头性质的。第二，不同于今天西方国家流行的以代议制为特征的间接民主，雅典

^① 雅克琳娜·德·罗米伊：《希腊民主的问题》，高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128页。

城邦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制，公民直接参与城邦的最高权力决策，投身于城邦的公共事务中，而不是通过在各个选区选举出一位或几位代表，代表自己行使权力。在雅典城邦中，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公民大会就是由拥有公民权的全体公民共同参加的，每位公民都可以在大会上发表意见，行使自己的表决权。第三，雅典城邦中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①，并非政党政治。古希腊时代的思想家——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普遍反对党争，激烈的党派纷争会极大地削弱对城邦公共福祉的追求，从而导致城邦的衰败。应该说，古希腊的这一思想脉络一直影响到启蒙时代。在西方近代观念史上，无论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还是英国保守派思想家埃德蒙·柏克，均视党派政治为政治生活的一大障碍，党派政治被认为是追逐狭隘的利益目标，从而有损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卢梭坚决主张排除掉“派系”和“小集团”等因素对政治决策的影响，“为了很好地表达公意，最重要的就是国家之内不能有派系存在，并且每个公民只能是表示自己的意见”^②。所以，卢梭反对公民彼此之间的利益勾结，他希望合格的公民都能够独立自主地发表个人的看法，既不受别人的裹挟，也不被别人所煽动。第四，古希腊民主之所以能够实行全民参与的直接民主制度，根本原因在于城邦民主的适用范围很小，在雅典城邦中，享有公民权利并且经常性地参加集会的人数大概就是几千人。正所谓“小国寡民”。可以想象，如果这一数字扩大到几十万、上百万，那么选择集会的地点都会成为极大的问题，更遑论进行讨论和决策了。所以，当领土面积广大、人口众多的现代民族国家实行民主政治的时候，间接民主制度就取代了直接民主制度。而且，雅典城邦中的公民之所以能够做到经常性地参加集会，是因为很多劳务工作都是由奴隶完成的。这些客观条件都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存在很大的差别。间接民主制度需要选举出代表进行间接治理，所以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问题就变得重要起来，以至于当代西方的间接民主制度被一些学者称之为“选主”。

仅就当代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而言，它就包括各种各样具体的制度形式：在宪法权力的设定上，分为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在行政权力的归属上，分为总统制和政党内阁制；在立法权力的分配上，分为一院制和两院制；在议会代表的选举上，分为比例代表制和“赢者通吃”的制度；在投票决策的时候，程序设置可以划分为绝对多数和相对多数。在此基础上，西方学界形成

① 王绍光：《民主四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0页。

②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6页。

了很多种理论派别，如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精英民主等。不少西方学者试图整合民主理论的资源，对从古至今的民主模式进行归纳区分。德国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区分出三种民主模式——自由主义民主、共和主义民主以及程序主义民主^①。对于程序主义民主被单列一类，学术界并没有达成共识，但是，把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列为民主的两种基本模式已被西方学术界普遍接受。一般认为，共和主义民主概括的是古希腊罗马的古代民主模式，强调公民责任、公民美德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这种理念在今天已经不是主流，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主流形态是自由主义民主模式。

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最核心的原则是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优先性原则。优先性体现在个人权利和自由是第一位的，是必须加以严格保护的，绝不能仅仅为了集体利益或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对它们的重视和保护构成了民主制度合法存在的哲学基础，而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对政治美德和公民责任的强调则被削弱甚至是替换。事实上，当我们把个人权利和自由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共和主义民主所强调的共同善等概念就必然会被放弃。因为既然个人权利具有优先性，那么自然而然个人有权自主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小到兴趣爱好、职业规划，大到价值理念、宗教信仰，一切的选择都归于个人。从个体的视角出发，我们每个人的选择都会带上极强的个人色彩，最终必然会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个体选择的多样化侵蚀了共同善存在的根基，而国家又无权强制干预个人的自由选择，也无权指定一种共同的价值理念来要求所有人遵从。包括爱国主义、家庭伦理等在内，传统的价值理念都遭到自由主义者的质疑，他们乐于宣扬的理念之一就是所谓的公民不服从理论。个人优先于社会，权利优先于善，选择优先于目的，所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要义。

从根本上讲，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优先性原则奠基在现代理性主体观念的基础之上。西方近现代主体哲学把我们每个人都视为一个理性的道德主体，这一道德主体被视为摆脱了一切未经选择的传统、习俗和道德纽带的约束，迈克尔·桑德尔称之为“无负荷的自我”（unencumbered selves）。即我所接受的一切观念、原则和生活方式都必须是经过我个人的反思、批判和选择的结果，否则就无法证成道德主体的绝对首要地位。因此，康德式的理性主体就表现为一个选择中的自我，而自我的选择能力将优先于选择的目标。对于

^① 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9页。

这种孤立的、理性的、自足的主体观念，查尔斯·泰勒将其称之为原子主义的哲学观点。原子主义的理性主体观念为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下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优先性奠定了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基础。在这样一种基础上，个人主义思潮在西方社会中兴起并逐渐泛滥。

■ 1.2 个人主义思潮的缺点与不足

关于个人主义思潮的起源，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艾伦·麦克法兰有一番基于历史维度的分析：“个人主义是在英国被创造出来的。英国是第一个真正推崇个人主义精神的国家，它随后被传播到了美国，现在它被广泛传播。”^①与麦克法兰的观点一样，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更是直言，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追溯个人主义的起源，贝拉认为，17世纪的英国出现了一种对个人权利的激进的哲学论证，约翰·洛克是这种激进哲学的代表人物。这种哲学思想的核心是认为个人先于组织化的社会而存在（于自然状态中），而社会的出现不过是个人之间为了追求和完善各自的利益而结成的自愿性契约，此即现代西方社会制度的理论基石——社会契约论。贝拉将洛克式的激进的个人权利理论称为本体论的个人主义。洛克的这一思想对美国的建国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罗伯特·贝拉提醒我们注意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国文学有一个根深蒂固而又不断再现的主题，即主人公必须脱离社会，仅以一人或几人为伍，才能或在蛮荒旷野，或在茫茫大海，或在群居社会的边陲之地实现道德的善。”^②正如丹尼尔·笛福笔下的荒岛上的鲁滨孙，就是近代资产阶级的形象在文学上的反映。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在论述西部边疆开拓对美国文化的影响时说：“美国式的个人主义是一种成就感，而非一种离心倾向。……堪萨斯的个人主义有个根本的特点，那就是倾向于服从；它是一种讲求服从而非反叛的个人主义。既然学会了忍耐到底，他们也就学会了服从。……在边疆，人们很快就学会了服从那些最基本的法则，因为抗拒或漠视它们只会是死路一条，在那里，生存法则无时无刻不在起着作用。”^③ 贝克

① 苗千：《不存在判断文明优劣的标准——专访剑桥大学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25期，第117页。

② 罗伯特·N. 贝拉等著：《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周穗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93页。

③ 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马万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页。

尔的这一解读可以补充贝拉的观点。

在今天的学术界，学者们愿意比较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异同。20 世纪后半叶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的出现增强了亚洲各国的自我肯定，各国的领导者普遍相信，亚洲在经济上的成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亚洲传统文化的影响。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东西方学界都兴起了对“亚洲价值观”的热烈讨论。原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就认为，东亚在经济上的腾飞主要是源于东亚文化更强调集体而非个人：“东亚人（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和新加坡人）的带有更强群体意识的价值观和实践，在赶超进程中表明是明显宝贵的东西。东亚文化所持的价值观，如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支持了团体的努力，而这对于迅速发展是必要的。”^① 不同于强调集体主义的亚洲价值观，西方近代个人主义思潮有个特点，为了追求普遍主义的权利优先性原则，原子式的个人被剔除掉一切外在的标识——民族的、宗教的、文化的、性别的，而只保留一个独立的、理性的主体自我概念。按照法国近代哲学家笛卡尔的刻画，自主的理性主体将会怀疑一切。自由主义对自主选择的强调实际上隐含着对个体理性的高度信任。在这种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无论对理性有多么严厉的批判，其实质仍然是对个体理性的高度依赖。个体为了反抗理性规训秩序的霸权而故意放纵自己，去反潮流，这些行为和言说的背后就没有理性的影子吗？答案是否定的。在任何一种正式的选择之前，都会有对形势的判断和对自身因应能力的衡量。后现代主义者选择反潮流，这一行为和理论本身就要求他对什么是潮流有自己的判断，而自己给出的替代方案又能够言之成“理”，这样才有理由去说服别人。批判和解构绝不单纯是情绪的宣泄，否则撰写大部头的理论著作就没有意义。批判和解构恰恰是理性的人类行为。解构者可以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但解构不了理性本身，我们从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中看到的是他们对个体理性的纯熟运用。

问题是，我们能否相信原子式的无负荷的自我的可能性？“我们理性分析和选择的能力都是社会的产物，正义和其他社会价值也都是社会 and 历史的产物”^②。离开具体的社会情境来谈论抽象的价值、原则和观念是没有太多意义的。人的概念并不是单纯作为一种观念预设而高悬在我们的头顶之上，恰恰是每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所承载着并体现着这一概念的细微之处。我们其实都是作为特定的社会身份的承担者而与这个世界打交道的。自由主义

①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 年，第 111 页。

② 冯颜利、郑一明主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题》，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 年，第 38 页。

者对个人的存在做“减法”，减去个人的内在和外在的所有约束条件，得出一个纯粹的理性主体概念。但是，在抽离掉个人的所有身份角色和外在标识之后，自我将只是一个抽象的、空洞的概念，因而也将是无法认识的。在清除了民族、历史、文化和信仰的影响后，我们甚至不能对哪怕是最常见的社会现象进行解释。美国政治哲学家和法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提出过一个颇为有趣的问题：“生活在距离加利福尼亚州与内华达州分界线仅一英里之遥的加利福尼亚人，或者生活在距法德国界仅一英里之遥的法国人，他们的统治者与边界另一侧一英里地方生活着的那些内华达人或德国人完全不同。”^① 对于这种常见的政治现象，任何的自由主义哲学原则都没办法解释清楚。脱离开历史的和文化的阐释视角之后，政治哲学家完全无法说明为什么全世界的领土面积被划分为如此众多的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的边界到底又是如何产生的？

对于个人主义所无法圆满解释的这些问题，共同体主义则给出了相应的回答。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指出，人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因而是社会性的存在，单个个体的非自足性决定了城邦建立的必要性。我们每个人仅仅依靠自身的能力都难以生存下去，只有生活在一个城邦共同体中，我们的生存需要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城邦的存在既要满足每个人的生存，更要促进良善生活和善观念的实现。很明显，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共同体思路并不仅仅着眼于保障个人的生存和利益，它还包括对共同善的重要承诺。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基础上，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明确提出了伦理实体的概念。不同于近代社会契约论所代表的理性建构主义的思路，黑格尔不赞同建构国家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与利益，他认为，这样的国家是缺乏伦理理念的。黑格尔主张，国家是一个伦理实体，“单个人是次要的，他必须献身于伦理整体。”^② 个体只是作为共同体当中的一员而存在的，共同体所承载的道德、习俗、价值观念构成了个人认知在先的基础。马克思的思想恰恰处在“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这一传统思想脉络当中，他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③ 但是，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

① 罗纳德·德沃金：《刺猬的正义》，周望、徐宗立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15页。

②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9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1页。